

1957.7.12.

102

星期五

群众集会向右派分子進行說理斗争

劉寶智重彈老調假檢討

昨晚在西飯廳舉行了批判劉寶智的大会，這是第二次了。在会上，大家對劉寶智的右派言行繼續進行了說理斗争。

在王殿厚等同志的發言中指出：劉寶智根本不是誠心誠意地幫黨整風，而是別有企圖的。他捏造事實，收集一些個別、片面的事情加以夸大，而達到醜化黨，向黨進攻的目的。同時，他打擊積極分子，攻擊人事保密制度，歪曲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這些，不是右派言行是什么？

會上還揭發了劉寶智煽動群眾的事實。呂桂彤說，劉抓住了群眾的一些情緒來進行煽動，如對機械系同學說，鞍鋼只需要30個畢業生，弄得學生人心慌慌，以至到國務院去請願，他這當中起了點火作用。其實劉寶智對鞍鋼有幾個廠都還不清楚，而他捏造了只需30人的謠言，其用意不是很明顯嗎？

劉寶智在群眾的要求下作了檢查，但他重彈了前幾次檢討的老調，迴避實質問題，避重就輕地企圖蒙混过关。他把他的錯誤歸結於舊眼光看新事物；犯有小資產階級的毛病，心胸狹窄，愛懷疑，愛用諷刺語等。

對誰有利？

—駁劉寶智關於公開人事檔案的錯誤主張

李

劉寶智在幫助黨整風的名義下，發表了一系列反黨、歪曲事實、破壞團結、削弱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反對人事保密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劉寶智講：“國內階級敵人，已基本上肅清。有，也不過是極少數。今天大家相處，應是一家人，有什么話不能講，還有什麼密可保？”因此，他反對人事保密制度，主張檔案公開。否則就“使得每個人提心吊胆，兢兢業業、工作上束手束腳，行動上惶惶不安。”成為“激發每個人的積極性”的“最大的阻力”。

總的一句話，劉寶智以責問和威脅的口吻要求國家放棄人事保密制度，使檔案公開。

對劉寶智的上述“理由”和要求有必要進行一些分析，由此來說明這種言論的本質和危害性。

劉寶智說：“國內階級敵人，已經基本上肅清。有，也不過是極少數”。這一點是事實，我們是同意的。但在目前的形勢下，人民內部是不是象劉寶智所說的：什麼話都能講，人事機密也不用保。我們的看法恰好和劉寶智相反。首先，我們不能同意人民內部什麼話都能講的說法。因為在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同時並存，階級鬥爭還很激烈的今天，觀察人民內部問題，仍不能離開階級立場，堅持無產階級立場是看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因此今天在人民內部，無論是領導或群眾都不能是什麼話都可以講。講話還是有界限的，有分寸的。凡是違背法律，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對敵人有利的話就不能講。作為群眾有遵守法律，保守機密的義務，對於領導更應該如此。所以，能不能講的問題，實質上是要不要立場問題。劉寶智要什麼話都講，首先是不要立場的一種表現；同時也是絕對民主化傾向的外形。

同樣，我們也反對劉寶智不需要人事保密的主張。我們知道，保密制度是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保密制度，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的保密制度，每類保密制度都是為本階級的利益服務的，何時見過美帝國主義肯把保密的東西公諸于世？今天保密之所以必要，應從二方面分析，從國際關係來說，帝國主義還虎視眈眈地窺視我們國家，不斷派遣特務到大陸來刺探、收集情報；從國內來講，台灣還沒有解放，還有殘余反革命分子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保密工作的任何放鬆和疏忽，都會是為敵人和壞分子的進攻開辟方便之門。雖然，劉寶智也認為軍事建設資料保密。但有必要對

群眾對劉寶智的這種檢討表示極大不滿，遞了幾十張條子，對劉寶智提出質問。同時在發言中對劉的檢討也一一作了批駁，揭穿了他在檢討時所挖的假根，他的假檢討在群眾的追擊下已經站不住腳了。

楊世經同志在發言中分析說：劉寶智檢討的第一點是用舊眼光看新事物。所謂用舊眼光看新事物一般說來是指思想落後於實際，但並不一定是反黨思想。而劉寶智對黨是那樣反感和痛恨，顯然，他用這一條是解釋不通的。劉寶智檢討的另一點是自己犯有小資產階級的毛病。楊世經同志指出，劉寶智想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天真的孩子，可惜還是掩蓋不住馬腳。劉寶智對黨的攻擊和污蔑，是受着階級仇恨所支配着的，這種感情和仇恨的出發點，才是劉寶智真正的錯誤思想的根源。

在光天化日之下，劉寶智死死擋着抵擋陽光的紙傘，已經被群眾擊破了。人們不再希望看見劉寶智再擡起另一把傘，這種狡猾對他沒有什麼好處。劉寶智必須作徹底的根本性的檢查，把自己的心掏出來；否則的話，只会自絕於人民。

中共鋼院整風辦公室通告

一、關於于樹德推打姚妻問題，法院已在七月五日判決。根據法院宣佈（原文待發）：于樹德同志污辱少數民族、推打少數民族婦女，系一違法行為；但經過學校處理，于樹德同志已做檢討，並向姚妻道歉、賠償医药費損失，即免于刑事處分。

二、徐昭霖濫用公款問題。檢察院通知稱：關於徐昭霖貪污事件，同意你院原來處理。檢察院不再予以起訴。

三、福利補助費問題，王長恩同志退回80元，倪治順同志退回50元。 七月十一日

感謝黨對我的批評和處分

于樹德

我的錯謬

做為一個受黨多年培養和教育的我感到十分的慚愧，由於我作風粗暴、修養極差，以致犯了侮辱和推打回族婦女的錯誤，給黨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響。這是十分嚴重的。

事件發生以後，起初我總強調是互相動怒推打的情況，不願承認錯誤。但經過組織上一再批評教育，使我初步認識到了錯誤實質；感到組織上提出的“檢討不深刻”，“推就是打”，“要嚴格要求自己，她是少數民族婦女，不能怪她”等等批評都是正確的。特別在整風運動中組織決定我停職反省，這些更有力的教育了我，應深刻的進行思想檢查。現在我們的確感到一個共產黨員應當善于處理周圍所發生的問題。可是我竟粗暴的動怒辱罵姚妻，甚至在她來抓我時也沒有抱着應有的忍耐，好心勸告，以致推打了她，造成了姚家的不安，損失了黨的威信，這當然是黨紀所不容的。

我接受黨給我的處分

組織上給我以黨內警告處分是應得的，我接受黨給我的這個處分。我在今后一定要克服自己的粗暴作風，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關心群眾的疾苦，保証今后不犯或少犯錯誤。組織上決定讓我給姚家道歉，賠償医药損失，這也是完全應該的。我出于真心實意親自到姚海榮同志家和姚妻娘家賠罪道歉，並且甘心情願賠償損失30元，以表示我悔過的願望。現在想來，我實在對不起姚海榮同志及他的家屬。我再一次公開的向姚海榮同志及其全家道歉。

供大家探討的問題

我的錯謬經過了整風運動前后兩次處理，整風運動前的行政處理是姚海榮同志出於自己的心願，我感謝他原諒了我。整風后的法律處理也結束了，我進一步認識到我們黨和政府這種實事求是的辦事精神。雖然沒有判我刑，但我自認是有罪過的。可是不能不提到這件事的內幕，就是陳先保、趙德本、王桂興和韓宜瑄等同志始終是積極參與了這個事件的活動，他們之間互相來往，奔走呼號，好象要為姚海榮申冤。他們之中有人訪問過我，但絲毫也未能客觀的進行分析，只是偏聽偏信一面之詞，我感到他們這種做法，不但對我沒有幫助，就是對姚海榮也造成了極大的苦惱。究竟他們的用意是什麼？我希望大家能以互相幫助的立場進行探討。

我还記得，在第一次開庭時，回來的路上陳先保、藍玉文等同志都勸我承認打了姚妻，說什麼“打就打了，你就承認吧，沒有什麼。”第二天上午有魏承永同志到我家，依然勸我說：打就承認吧，陳先生、王桂興、藍玉文他們準備讓姚抽回上訴……又說：藍玉文和你本人到沒有什麼，就是對黨和行政出一口气……所有這些話究竟是勸告，還是別有用心？究竟出於何人之口，何人之心？我都無從了解，所以也提出來，希望大家探討。

劉寶智為什麼要挑撥離間煽動群衆

宋 勇

挑撥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關係。

劉寶智說：“我院黨領導下，民主黨派無一席地，發揮不了作用，也說明黨和學院對於號召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思想上還有抵觸，還沒有好好的貫徹。”我院的黨和民主黨派真象劉寶智所談的那樣嗎？不是的，我們黨對民主黨派是很重視的。民主黨派的成員在我院教學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可通過每年的教學任務看出來的。民主黨派是始終堅固團結在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那麼劉寶智為什麼要挑撥這樣一個關係呢？

挑撥黨與教師之間的關係

劉寶智說：“教師們同有此感，參加鋼院工作，如同掉在冰窖里‘毫無溫暖’，理由是什么呢？要求進步的同志，主動找支書談問題，不是不耐煩，就是聽着，酣然大睡，使靠攏黨的同志那能不傷感。”是的，我們不否認個別的黨支書是存在缺點的，但劉寶智不能把它夸大為教師們都同有此感。實際上黨對教師的政治問題是關心的，而且教師入党還是個很大的數字。這一點我不知劉寶智是如何解釋的。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挑撥教師對黨疏遠，不去接近黨，使黨孤立的用意何在？

劉寶智煽動群衆

他向工友說：“學校的行政人員，科長工資太高啦，而你們工人的工資实在太低。”劉寶智說這句話，不是為了關心我們工人的生活，而是促使工人對黨對領導不滿。接着，劉寶智又向工會建議“召開五五年以前在校的工人大會，但不希望黨委參加”，我們不禁要問劉寶智你用意何在？為什麼要召開這樣大型的會議？為什麼不希望黨委參加呢？

在整風中，劉寶智是搞人事採用檢查工作的，為什麼你要檢查工資呢？當人事處不給你工資材料時，你又向財務科要全院教職工從53年到目前工資的變動情況。並要詳細的工資表。請問劉寶智，你這不是有意乘當時群眾對工資有意見的時候，抓住群眾心情進行煽動，企圖使黨處於孤立麼？

更嚴重的是劉寶智煽動師生員工用暴風驟雨的方式向黨進攻。可能同志們認為這一帽子太大了，我們可看看事實：整風運動中，黨委對貫徹邊整邊改的精神和決心是很大的。遺憾的是劉寶智却把此歪曲為：“黨委還是躲躲閃閃。報道歪曲失實，用搪塞敷衍的手法。企圖蒙混过关，給群眾的印象是病入膏肓，和風細雨的批評和建議是不能收到除病的實效。”我們真不理解劉寶智為何認為用和風細雨的方法整風已不能收到效果。那麼你用什麼辦法呢？要搞一大民主嗎？還是要搞什麼其他的呢？

劉寶智的辛勤勞動是爲了什麼

劉寶智訪問過很多的地點，我想舉一個地點的對話。劉寶智到托兒所，訪問過某同志，他說：你經常看院刊吧！某說：“經常看”。劉寶智說：“你看过劉景芳的兩篇發言吧，他的發言很好，應該很好的看看，劉景芳这个人很能幹而且有才能，他對辦學校是有經驗的，他過去曾任輔仁大學教務長”。同志們聽聽吧！這是什麼聲音，誰在讚美劉景芳呀！我們經過幾次的會議都知道劉景芳的右派言論，向黨進攻是惡毒的。為什麼劉寶智對他如此讚美呢？嘵：我今天明白啦，原來你們是一唱一合，是同路戰線的人哪！

劉寶智的最後目的是什麼

我們看看劉寶智的目的，我說和劉景芳是一致的，不過劉寶智在提法上隱避了一點。現摘劉寶智的几段話如下：劉寶智說：“黨在高等學校領導是必要的，但我的黨委領導是不夠堅強”，為什麼單獨我院的黨委領導有問題呢？劉寶智又說：“靠所謂的積極分子，斷章取義的汇报，能办好學校嗎？靠機關式的作風，發號施令，用搞運動的方式，能办好學校嗎？單凭幾個自封的革命功臣是達不到目的的”。是的，按劉寶智的邏輯，這些人是不能办好學校的，那麼你對全體黨委的印象如何呢？你說：全體黨委同志沒有擔任教學的，也沒有進行科學研究的，我不懂黨委會議如何決定學院的大政方針。劉寶智又說：“我院黨委病入膏肓，把新生的鋼院搞的一團糟。我們可看看黨委會議，不能決定學院大

政方針嗎？真的把鋼院搞得一团糟嗎？不是的，我們都知道，鋼院過去是平地，現在有很多的樓房，有師生員工五千餘人，每年向國家輸出很多的學生。我們每年的總結都談到成績是主要的，缺點也有，是個別的。劉寶智你能認為這是不真實嗎？那麼你認為黨領導鋼院有問題，都是來過官能的，無法領導那誰是主要的力量呢？這點劉寶智說：辦學校是細緻的長期的，具體踏實的工作，對象是青年，青年的成長是靠前輩的帶路人，品質的好壞，也取決於教師平時的薰染，學校應有學術氣氛，教師是主要的靠山”，听听他把黨放在什麼地位呀！你的最後目的不外是使黨退出學校。

不能這樣歪曲事實

鳴 意

看了劉寶智在教授座談會及教研組座談會上的發言，以及對“中共鋼院整風辦公室六月一日公告的意見”後，我認為劉寶智對有些問題的看法是錯誤的，歪曲事實的。

也是下的猛藥

劉寶智對六月一日高院長的報告，表示不能滿意，說高院長的報告“給群眾明顯的印象是病入膏肓，和風細雨的批評和建議，不能收到除病的實效”。言下之意，非狂風暴雨，七級颶風不能解決問題。我倒奇怪，和風細雨的批評和建議，適用於處理一切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黨几十年來的經驗總結，為什麼在劉寶智眼里的鋼院領導，就不適用這個辦法呢？是否劉寶智也象劉景芳一樣的主張，要來一付猛藥，把鋼院黨的領導請出鋼院去！

捕風捉影歪曲事實

1、在59期及62期院刊上劉寶智的發言說：“據說五月五日魏張兩位院長，各帶愛人和小孩分乘兩輛汽車进城溜了一趟”“但我相信決不是中央機關召開家屬聯歡會”，言下之意，是兩位院長乘公家汽車进城閑逛去了，是享受特權，因而感慨的說“老干部建國有功，在物質享受方面，黨和學院對這些人另眼看待，形成特權階層，一般人不得與他們相比”。其實劉城寶的推想完全是錯誤的，五月五日兩位院長帶愛人小孩进城，是去陪專家春遊，是代表鋼院全體師、生、員、工向專家稍盡主人之誼，不是去閑逛，也不是中央機關召開家屬聯歡會。

2、第59期院刊劉寶智說：“校醫室有位大夫，人家稱之為御醫”。有人傳說，上次評薪，人事室起初不準備加他工資，由於總務處收了他的禮，因而為他說好話，結果增加了工資。”據我們了解，這件事完全是捏造，是對同志的污蔑。希望劉寶智把傳說的人講出來，以弄清事實，平息謠言。

3、為揭露浪費，厲行節約，我院曾成立節約委員會，各處系室設分會，組織揭露積壓浪費現象，委員會下設辦公室處理日常事務工作，辦公室分設備、人事、財務經費、生活福利四個檢查組，各組任務是了解各分會揭露的積壓浪費現象，並進行處理。為便利工作進行，各組長由負責各該組工作的同志擔任。這種組織形式有缺點，還有什麼方法更好，劉先生可以提，但遺憾的是劉寶智不但沒有提出應該怎麼辦，反說這“是掩耳盜鈴的做法”，“只靠自己揭自己的瘡疤，結果一定不能真正達到揭露瘡疤的目的”。並說，這樣做法“使他大事說少，小事抵賴，或曲為解釋”。我不知道劉寶智是否打聽過有關人員，關於成立檢查組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及時的了解、處理積壓浪費事件。如果不問皂白，只凭自己主觀想像推斷，則不知劉寶智的居心何在？

4、劉寶智在結束發言前說：“我還要暴露兩個問題。我主觀認為這些做法是抵消“鳴放”作用，兩個問題中的一个是：某星期三下午，節約辦公室一專職干部來力學教研組查詢40餘人戶口……等。訪問時對象不是我教研組主任，而是鬼鬼祟祟向二位青年教師察問。這種作法確有令人膽寒之感。這使我懷疑到：是不是要拉攏組內成員，整一整我，是不是警告青年同志不許亂放，使組內分化，造成不團結。據了解，在揭露積壓浪費期中，力學教研組會提出一些問題，並要求節約辦公室答復如何處理。辦公室為了更具體的了解情

況，以便向節約委員會提出處理意見，故由秘書秦祖武（群眾）到教研組去打聽。但沒有想到却惹得劉寶智這一大堆懷疑，引起那麼多的戒心。俗話說心中無冷病，不怕吃西瓜，劉寶智又何必大有“風聲鹤唳”之感呢！

是別人侮人，還是自己過份

劉寶智說：“王慕林嚴重的違反了黨的政策，沒有從原則上團結知識分子”。原因是他的小孩砸碎了在教授宿舍旁的磚瓦。事後王對劉說：“你應該教育教育你家小孩”，因而劉感到有傷他的自尊心，便寫信給院長、黨委、工會；要求組織檢查組對這一事件進行處理。事後，其小孩在宿舍牆上到處寫“王慕林王八蛋”的謾罵語句，其實公家的磚瓦是不應該損壞的，別人提意見是對的。劉寶智在看到別人損壞公物時，不也認為不对嗎？對自己的小孩為什麼就不能以事論事，实事求是的看問題，反而惱怒別人不該提呢？同時你的小孩到處寫辱罵王慕林同志的字句，你曾經想到這也是傷害別人的自尊心嗎？作事應當“將心比己”。最後劉寶智還說：“我在高等學校作了半多年的教育工作，今天有人要教育我，要教育教育我家小孩”。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恰當的。教授的孩子，不是天生是就懂得一切，我想受教育是應該的。不然劉寶智为什么要送你的小孩上學校呢？希望劉寶智不要把自己的自尊心看得過份了。

(上接第一版)

目的是一致的。如果硬要說人事保密阻碍了積極性，那只能是阻碍了右派分子，與黨離心離德的人的積極性，但这錯處不在于人事保密，而在于他們自己。

“理由”的第三點，說什麼個人的“優點不敢自封，缺點無法知曉”。因此只有公開檔案，好“借他山之石，可以改錯”。個人對於自己的認識往往只有片面性，但這並不排斥對自己優、缺點認識的可能性，否則自我批評也就不必要了。這種自我認識的缺陷，通過什麼方法來補救呢？一方面要端正自己的認識方法，另一方面要誠意征求同志們的意見來揭露缺点，從這個意義，也可說“借他山之石，可以改錯”。但劉寶智所指的“他山之石”，其根本目的，並不在於要取得同志們的批評意見，不是誠心為了改進自己的缺點，（何況，檔案中所記錄的缺點，正是你自己寫的，同志們給你提過的缺點，不會無中生有亂造一套）。而是要翻檔案的底子，以“改錯”之名來探檔案之秘。真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要想知道組織上對自己的了解，唯一的方法是靠攏組織，對組織忠誠老实，根本問題不在于組織了解不了解你，而在于你了解不了解組織，是否信任組織。要想使組織信任自己，就應該信任組織。

劉寶智還要將檔案公開，說成是“在團結批評基礎上，達到新的更緊密的團結”。這正是對“團結——批評——團結”公式的濫用。按照劉寶智的意思就應該把公式改為：“團結——公開檔案——團結”。真是可笑之至！首先公開檔案並不是為了團結，而是破壞黨群、領導和被領導的團結，當然也不能想象可以達到什麼“更緊密的團結”。

根據上面所分析的，我們對劉寶智的言論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1、劉寶智的公開人事機密（主要指檔案）的主張及其“理由”完全錯誤，我們堅決反對。劉寶智這種錯誤的根本原因在於：劉寶智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向國家的人事保密制度進攻。

2、這種言論只是對敵人有利，無利於社會主義。

3、劉寶智這種言論實際擾亂群眾的視線，煽動群眾對學校和黨不滿，加深黨群之間的矛盾。

在我們學校里，同情劉寶智主張的人，還不是個別的，他們一度要學校把檔案公開，這些人也可能有別有用心，也可能是一時糊塗。如果有人至今對於人事保密制度的問題還想不通。我想請這些同志冷靜地想一想兩個問題：一、公開檔案對敵人有利，對右派分子有利，還是對人民有利？二、公開檔案，是否就能使消極變成積極，落後變為先進？是否能改進黨群關係？

當然，我們的人事工作的方法還有一定的缺點，如分配工作，人事調動等，須待改進，但不能因此而要廢除人事保密制度，要檔案公開。善意的批評，我們始終是需要的；但別有用心，於社會主義不利的言論，那怕是花言巧語，我們也堅決反對，並毫不留情的予以反擊！

章守華在7月5日教授、講師座談會上的發言

（一）打擊右派言行捍衛社會主義事業

正在全國人民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以章伯鈞、羅隆基為首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認為时机已到，對共產黨發動猖狂進攻。他們在全國範圍內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地發表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言論，並到處放火，活動，以達到他們想使資本主義復辟的目的。這

也出現了右派的言論及行動。與此同時，鋼院劉寶智等先生們所發表的言論，最惡毒的語言對黨進行污蔑。总的看來都是用捏造“事實”，說什麼謠罵，或是夸大缺點，……以及其他等等，其目的就是

劉景芳、趙錫霖等先生把學校說成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的合體”，“三黑，連中學生‘衙門’”。把學校形容成一團漆黑。

他都不願意來的地方。他們還說成是“吹拍奉承”、“打击積極分子”，把積極分子說成是“淺薄的人”，“歌德派”，“歌功頌德獲益非淺”的人。這是以扭曲黨的幹部政策及知識分子政策，以扭曲黨的幹部政策及知識分子政策。

劉景芳撥亂黨群關係，想使常用青年學生思想上比較單一，芳及蔣朝青等學生對他們在學術上的尊崇。在青年學生中到處點火。唯恐天下不亂，造成鋼院危機。

最後他們便拿出最後的法寶提出：“反對黨委治校，把學校交給內行人辦”。或推銷資本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下的教育制度。

鋼院的右派言行及行動與社會上右派分子的言行是相互呼應，為出一轍。他們的目的就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以達到反社會主義及反人民的目的。

應該指出劉景芳及趙錫霖等先生的手法是兩面派的手法，請看他們在對黨進行污蔑及謠傳時，却把自己划成“黨30年來的朋友”，“黨外的布爾什維克”。用“內行人治校”的招牌來推銷“教授治校”，以模糊一些人的認識。向青年學生放毒時先來一些眼淚、鼻涕，以博得青年人的同情。當群眾起來進行反擊右派言行時，却又避重就輕，不接觸自己反動思想的實質，反而多方詭辯，甚至繼續放毒。

我們必須嚴正告訴劉景芳及趙錫霖等先生，你們必須完全放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立場。徹底暴露自己的思想及行動。不然你們將自絕於人民。

今天我們應該感謝黨，在這右派分子進攻的狂風暴雨之中，掌握了船舵。揭穿了右派分子的兇惡面貌及其陰謀。當群眾認識了右派分子的真正面貌以後，便起來和他們鬥爭到底，以捍衛社會主義事業。

（二）趙錫霖歪曲事實

趙錫霖先生在5月25日的發言中，與教學及科研有關的幾點是歪曲事實的。必須說明真相。

1) 趙先生說：“聽話的業務好，科研要啥有啥，不聽話的業務都沒啥，科研困難就多。又如部院廠矿有某問題，要鋼院解決，或派教授去開會，明知誰對此問題或某事可能幫助較多，但因不聽話，不讓去。”這完全是捏造。例如全國合金鋼協調小組研討會議等，學校領導是請趙先生去參加的。所有的工廠來的科研項目都是在教研組主任趙先生主持下協商挑選的。教研組內還有四位講師、助教指定為趙先生的科研助手，等候了他半年多。黨、行政及教研組的同志對趙先生的科研工作是關心的，屢次催促他能早日開展科研工作，但他說不想做，至今沒有提出科研項目，而現在却說人家不讓他做，真是含血噴人。

2) 劉叔儀教授並未請求轉金相教研組，而趙先生却說成不准劉叔儀教授轉。

3) 關於聘請教授事，趙先生說：“好的不來……不對頭的，玩不轉的不要。比我們高興的，本領大的不請……”。據趙先生說是指陳能寬及郭可信兩位先生，其實這兩位先生曾由傅君詔先生及柯俊先生數次親往聯繫，邀請來校任教。陳、郭兩先生來校參觀演講時，我們都邀請他們來校任教，有幾次趙先生也親自參加的。為什麼今天趙先生又翻臉這樣說，居心何在？

4) 趙先生身為教研組主任，例應領導全

組教師的進修及科研工作，而事實上他是不聞不問的。

以上各點，說明趙先生提出如此莫須有的事情，混淆視聽，來說明他的所謂“鋼院宗派主義危害之大，難以估計”，以達到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知識分子應加強思想改造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的思想認識上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由於階級出身或因過去長期受資產階級學校中受教育的緣故，保留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還是相當濃厚。右派分子章伯鈞和羅隆基，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的陰謀的一部份，就是想奪取對知識分子的領導權，他們利用知識分子的弱點，向知識分子放毒。說什麼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已經是差不多了。說什麼“三顧茅廬”，“士為知己者死”，“一間房間二本書”等等，其目的就是在要鼓動知識分子拒絕思想改造，讓沒有清除的資產階級思想得到發展。

李達先生在這次人民代表大會說：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是右派知識分子向黨進攻的第一炮。右派分子的手法是陰險惡毒的，的確，這篇文章過去我初讀的時候，由於思想認識較低，也不知道他在放毒，在這次運動中，對於隱晦的反社會主義言論分辨不清，沒有想到會有階級鬥爭。直到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發表後，才知道怎樣辨別香花和毒草。這都說明了知識分子還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所以這次運動不但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對我們知識分子來說，也是一次思想改造運動。我們應該與右派分子戰鬥到底的同時，也教育自己。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須加強。

在7月5日教授、講師座談會上的發言

程述武

今天在座的都是教授先生、講師先生，只有我是助教，而且年齡也最小，我是來旁聽學習的，現在我想把今天（7月5日）早晨物化系工會上的發言介紹一下：

從劉景芳兩篇文章一次大會發言可以清楚的看出劉景芳攻擊黨是從中央到地方，從黨組織到個別黨員，同時又污辱了靠攏黨的積極分子，挑撥黨與群眾的關係，要群眾別靠近黨，而跟着劉景芳作所謂第三類人，最後在治校問題上把黨踢開。因此，劉景芳不但不是善意提意見，也不是發洩私憤，鬧情緒，而是一貫鮮明的站在反黨反人民的立場攻擊我們。在劉景芳文章中以及對同學講話時，一再強調的氣氛問題，也正是這種立場的露骨表現，正象柯俊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劉景芳一再勉勵學生學習史可法，但不知意中所指誰是多爾袞，誰是福王，這個多爾袞與劉景芳所說的“洋大人”有無關係。李救功同志對劉景芳的指責也是正確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這都是我們民族氣節最高的表現，劉景芳在那時不講氣節，反而求情於國民黨，可是到了人民的天下，到了新社會，却口口聲聲講起氣節來了，這種氣節乃是反動的氣節。

劉景芳在今天早晨的大會上不認識也不肯承認這種立場，這說明了劉景芳對自己的言行還沒有什麼認識，對自己反黨立場也不可能有什麼改變，居然還自称是心向着黨，但不知怎麼向着才好，以致害了黨。這些虛假的話怎能令人置信，而且劉景芳又聲明自己的覺悟只到這裡，那是意味著劉景芳要頑抗到底呢？我們都一定要劉景芳彻底交代他的各種言行和動機，他與院內外的右派有那些聯繫？我們不获全勝，決不收兵。

右派分子的共同語言

普化教研組 覃喻權

從批判劉景芳多次的辯論會後，我知道了事實還是事實，真理還是真理，劉景芳的任何兩面手法都不能逃出真理的事實。學習了毛主席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使我們掌握了六條標準去識別一個人，我認為劉景芳的言行不是屬於香花而是屬於毒草，不是善意的幫助黨整風，而是惡意的想把我們黨整死，這可從揭露的許多事實得到證明。

政治上的動機

社會上的右派分子，是有着政治上的野心，想在“整風”的幌子下向工人階級猛烈的進攻，奪取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他們主張搞個“政治設計院”，成立平反委員會或是要各黨派輪流執政。我認為劉景芳右派言論是與他們相似的，反對黨在高等學校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主張象劉景芳這樣的“內行人”治校，說我們黨是“主宗官”集團，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因而劉景芳的整編文章里，整個政治思想動向是以“主宗官”作為中心思想內容，誣蔑我院的整個黨和黨的工作，其目的在於取消黨的領導。

組織上的手段

儲安平的“黨天下”，葛佩琦說黨員是“便衣警察”，其他右派分子也說團員是特務，積極分子是拍馬屁，他們企圖把黨孤立起來，挑撥黨與群眾的親密關係。而劉景芳說我們黨是“主宗官”。說黨員在學校決定一切

一切，教授是教奴，學校是衙門，系主任是充數而已。並把人們分成三等，誣蔑積極分子，對於第二類人說成“明哲保身”者（中間分子），使他們和黨遠離，作為右派分子爭取的同路者。對第三類所謂落後者，說成是對客觀事物是有見解的，好提意見而得不到領導的重視（象劉景芳這類人），這是劉景芳自己抬高自己，打击別人的表現，使這一部份人對黨抱有敵對的情緒。

我認為劉景芳是別有用心的來製造人們對黨的距離，挑撥群眾反對共產黨。這並不希奇，卅年前毛主席在湖南革命時，當時的階級敵對分子把積極分子、貧農罵成是“痞子”。但毛主席給他們的評價很高，說他們是革命的有生力量。右派分子為什麼要罵黨的積極分子呢？這因為積極分子是黨的命根子，他們是跟着共產黨走，擁護社會主義，當然右派分子是要罵他們的。

但是我們的黨並不是輕視某一部份人和重視另一部份人，對那些能為人民服務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人都得到人民與黨的尊敬。並不象劉景芳所設計的三類人作為黨的不同對待。但在任何社會上人們的思想、行動是有所區別的，有進步、中間、落後，同時他們之間不是絕對的不能相互轉化。共產黨並不排斥那一部份人。我們黨一向是主張發揚先進，團結中間，爭取落後的，調整一切可能團結的因素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另一方面，黨始終是教育自己的黨員密切的聯繫群眾。這次整風也是為了改進過去黨做得不够的地方。同時也要更多的培養積極分子，誰都能成為積極分子，這樣做是為了加速社會主義的建設，積極分子是黨與非黨群眾取得聯繫的橋樑。他們是任何工作中都不可缺少的。我們知道在數學上要證明一道幾何題常用補助線才能証得出。在化學上為了加速反應過程通常要有一種催化劑才取得較好的效果。而積極分子就是起這種的作用。這是與右派言論所說的“拍馬屁，看風頭行事，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毫無共同之點。

毛主席曾說過：積極分子的作用估計是：他們特別努力，有更多創造，在工作中成了一般人的模範。他們起骨干作用和橋樑作用，他們是上面領導人員和下面的廣大群眾之間的橋樑，群眾的意見經過他們傳達上來，上面的意見經過他們傳達下去。

劉景芳罵積極分子，在運動中打擊黨的積極分子，而盡量爭取他自己的“積極分子”，當有人訪問他時，劉景芳先來個政治審查，這不是劉景芳也認識到一個人的力量是很小，臭蟲不能把被子擰起的。

思想上的兩面手法

右派大將軍、羅等他們口头上是拥护社會主義，是共产党的多年老朋友，而脚下却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們利用青年学生天真、阅历少、对旧社会生活体会不足的弱点来寻找他们的市场，追求他们的同盟军。刘景芳在我院也不例外，千方百計的玩弄两面手法，夸张自己“大丈夫气魄”，而刘景芳叫学生学习岳飞、文天祥的企图在于叫学生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同志們：應該警惕啊！刘景芳說：知識分子是可杀而不可辱，可作友而不甘为奴，言下之意，那就是今天的知識分子是被当做“奴隶”不得自由了。这是刘景芳不要馬列主义思想改造的具体表现。

刘景芳身为教授，应负有教育培养下一代热爱祖国之责，可是他的二个孩子竟要杀毛主席

（下轉第四版）

亂彈社到底彈了些什麼

弓

提起“亂彈社”，可能大家都還記得，雖然它生出來沒有多久就被夭折了，但是因為他們所彈的調子实在太不象話，當時就觸動了全院，引起了群眾的反擊。最近，在反擊右派言論的鬥爭中，人們不禁又想起了亂彈社，想弄清他們到底彈了一些什麼？

問題本來是可以弄清的。但是在幾次的討論中，“亂彈社”的成員們却想用各種巧妙的手法掩蓋問題的本質。他們否認自己有什么目的，說只是一時心血來潮而已，並且責備別人为什麼都要追目的查動機，說這是“教條”，是“打棒子”。也就有人真的相信了，說他們只是胡鬧而已。既然是胡鬧，也就沒什麼好討論批判的了。

真的是這樣嗎？事實並不如此。我要問一問“亂彈社”的成員們：你們自己不是一再說所以成立亂彈社是要“招引棒子出來好玩嗎？”（他們把批評右派的人民日報社論，及校內反駁右派言論的文章，稱作“打棒子”、“棒子”），姑且不去分析這種動機的本質，但這總是 yourselves 己嘴裡說出來的，這不就是你們的動機和目的嗎？為什麼又說沒有目的呢？此外你們不是也共同商訂了一個成立啟事，宣稱要宣佈你們“亂彈社”為什麼要成立，你們要干些什麼，不就是對全校公開宣佈了你們的宗旨嗎？難道這是別人強加在你們頭上，而不是你們自己寫的，自己貼出來的嗎？還有，從你們所寫的大字報可以看出，你們攻擊張伯生同志、諷刺“教條主義”，步調非常一致，能說沒有目的嗎？

總之，“無目的”之談，對你們已是不能自圓其說了。

那麼你們究竟是什麼目的呢？“招引棒子出來好玩”的意思又是什麼呢？是真心的幫助黨整風嗎？還是整“黨”助右派之風呢？為了使我們真正弄明白事情的本質，不妨回憶一下“亂彈社”到底是在什麼情況下組成的？“亂彈社”的成員們在整風的鳴放階段是非常積極的，他們提議組織，並且參加班里的鳴放小組。又提議改選班長及實習隊長，有的還提出要參加“競選”。總覺得鋼院太沉寂，不如北大活躍，希望人大林希翎能到鋼院來發表演說等。對社會情感上，覺得特別痛快……。後來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等三篇社論後，全國轉向了反右

派的鬥爭，我們學院也開始批判院內的右派言論，首先是劉景芳在兩次教授座談會的反黨的發言。不料這却大大激怒了“亂彈社”的成員，他們對社論表示極端不滿和抵觸情緒，說這是“收”了，說人民日報是“棒子”是“打棒子”，說現在簡直是“棒子滿天飛”，“教條主義”。對批判劉景芳的大字報，馬上出了大字報來反攻說“不許侮辱教授”。對儲安平的發言認為是善意的，“党天下”就是宗派主義的根源之一……。總之，“亂彈社”就是在我們開始了反右派鬥爭之後，這樣的轉折關頭成立和活動的，這就不難看出所謂“招引棒子出來玩玩”到底是怎麼回事，能說是擁護黨、擁護反右派鬥爭的表現嗎？能說是和黨站在一起嗎？为什么不把你們的精力用去打擊右派，而却招引棒子玩呢？這是什麼情緒？我說是對報紙社論及反右派的文章的一種反擊形式。

你們的啟事表明你們“要象狼一樣的吃掉教條主義”，你們要象狼一樣吃掉的“教條主義”是什麼呢？就是指的一切捍衛黨、捍衛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的言論。你們為什麼這樣的憤恨，這樣狠毒地對待你們所謂的“教條主義”呢？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它無情的打擊了右派。你們反對的是什麼，支持和保護的又是什么，這不是非常明顯的嗎？

看看你們的文章是怎樣“亂彈”的吧！你們寫的大字報“得令令調”、“新官場現形記”，其中沒有絲毫有根據的事實及實事求是的分析，而只是對團委書記的諷刺謾罵和人身攻擊。你們借用馬雅可夫斯基的詩，用小狗、母狗、貓恩、母貓來辱罵黨和靠攏黨、維護黨的利益的干部，就是你們所謂的攻擊“教條主義”，你們不去批判劉景芳的反黨言論，而是用“反對侮辱教授”、“反對扣帽子”對抗我們的“批評”，為右派言論辯解。你們社里的沈浪發表的“論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據問題”一文，通篇是对党的侮蔑歪曲，什么“老干部就知道要錢”，什么“不顧群眾疾苦了”，什么“大量出現陳士美了”。他歪曲了黨群矛盾產生的根源和矛盾的性質。他为什么要這樣歪曲呢？可見在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打棒子”的幌子下販賣的是什麼貨色！你們可能會說：沈浪的文章“本社概不負責”，你們不承認你們之間有什么共同的目的，說是各有各的目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你們都有著較長時期的對黨的懷疑和

不滿，想借整風之機來“整黨”，但正是你們得意忘形的時候，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反右派鬥爭開始了，引起你們極大的反感，確實激怒了你們，因此異口同聲的喊出了“反對打棒子”，反對“教條主義”，要象狼一樣吃掉“教條主義”，這就是你們共同的“思想基礎”。在這一共同的基礎上，你們聯合起來，組織了“亂彈社”。

誠然，你們的“亂彈社”壽命不長，也的確是因為你們組織的“時間地點不对”——因為大家的嗅覺靈敏多了，以致你們一露頭就被打了回去。不管你們活動長久與否，管你們用什麼“胡鬧”作护身符，人們看得清楚。你們並不是在“亂彈”，而是看生了我巴矛头对准的是帮助反右派，而却是散佈着右派文章；你們不反右派的人們發射子彈。你們想解除党的武装並不是“助党整风”，而是“整党”助风。

可是你們又為自己辯護說，只是得是由于才这样作的。也有的人受了迷惑，黨也承認，你們“幼稚无知”，這也是事實，我當的，但不學不無用在你們自己头上是更恰的主要根據。解釋你們今天所作所為的不同的，大家都知道，同樣一個問題可以有，為什麼立腳點、觀點不同。我要服對右派的解釋，你們認為是對黨、對我們制度的誣蔑，而你門却表示同情和贊揚，甚至于參加右派的產物，是當代才子呀！什麼“三會上的右派言論是如此冷血，你們的言論和言論非常冷血，斥責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你們却把這種責難說成是“打棒子”，“教條主義”。人家在打擊右派；你們却要象狼一樣的吃掉“教條主義”。人家認為反右派的斗争是堅持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道路；你們却認為是“反革命”。難道這不是說明你們的思想感情、觀點和人家完全兩樣嗎？難道這仅仅是“幼稚无知”嗎？而且這種“无知”是不是一時的呢？不是的！如果你們肯于開誠佈公的話，應該承認你們在較長的時期內存在著對黨的懷疑和不滿。前面所舉過的一些奇談怪論，還在“再論”學習時，即出現過，在這次學習討論時，你們並沒有對這些論調懷疑，反而有所發揮，因此在整風及反右派鬥爭中，你們的一切表現，都不能用一時心血來潮和任何偶然因素可以解釋的。

奉勸“亂彈社”的成員們，面對現實，不要躲閃吧！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承認錯誤，痛改前非，尚為時不晚。

來函照登

編輯同志：

院刊98期第六版機57.4班周波等四位同學的“干部班是‘特權’班嗎？”的報道，其中“關於調換李梅英老師的問題”，說“我們認為由於教學效果太差，同學要求調換老師是絕對不可以的，但問題在於业余教育科這一決定如此突然，它在客觀上……”，我認為這一報導與事實不符。

李先生調換不是我科“突然決定”的，請看院刊75期第四版數學教研組容爾謙、朱元泉給編輯的信便知。不過那封信上說我“就簡單的用一張條子停止了李先生的工作”，需要說明。

當魏教務長通知我“教研組已同意李先生2.3班三角課由錢先生接1班仍由李先生擔任”後，我就給朱秘書打電話，內容：①請他向李先生進行解釋，免得發生誤解。②由下週起錢先生接課。這兩個問題，當時朱秘書都同意了，我們才分別通知錢、李先生（通知內容見71期李先生文章）。這不能說成是我“簡單的用一張條子停止了李先生的工作。”教研組為什麼沒有和李先生談則我不知道。李先生的調換，教務長會囑我“要和李先生談談”，我未談，是不對的。

业余教育科 賈鋒

孫明久的右派言行

俄文教研組 一鳴

在“鳴放”初期，特別“積極”給黨員提意見的孫明久，在反右派鬥爭中保持沉默了。為什麼？他自己說：“過去我提意見太多了，太尖銳了，現在等着挨批評了。”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他過去的言行。

點火會

整風剛開始時，孫明久和李治全一起起草了一篇稿子“俄文教研組太上皇呂貴麟”（呂是黨員），但嫌內容貧乏，於是靈機一動，假助整風之名，召開了十幾個人的會，來充實這篇文章的內容。會議在孫、李兩人的主持下“順利”地進行了。在會上孫等挑撥黨群關係，歪曲黨的政策，醜化黨員形象，盡其污蔑之能事。同時還互相交換了情況：甲對乙說：“呂貴麟說你缺德”，丙對丁說：“呂貴麟說你最落後”，戊對己說：“呂貴麟想開會鬥爭你”。庚對辛說……乙、丁、己等人听说呂貴麟竟在背後“打击人”“污蔑人”，于是就破口大罵呂，甚至还有人氣得跳起來了。顯然，孫、李的點火目的已達到。其效果表現在第二天工會小組會上。

只許我放，不許你鳴

當小組會上有人發表與孫不同之意見時，會場當時一陣混亂：甲氣勢兇兇地制止對方發言，乙高聲喊撤換會議主席，丙提高嗓子叫休會，丁……，會後還要給對方出大字報，說別人压制了鳴放，因為找不到簽名的人，只好作罷。當他看到一鳴的“辱罵和恐吓決不是戰鬥”一文後，馬上組織十人開會研究對策，結果大家一致地通過了孫的反駁文章，“一鳴同志歪曲事實，居心何在？”

右派言論

孫明久認為肅反是違反法制的疲勞轟炸，

認為今天在我們國家內沒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說黨團教育的結果使黨、團員思想僵化；說汇报制度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沒有真正的友誼，互相猜疑；污蔑积极分子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才靠近党团，是假积极，污蔑党员不学无术……。其言論詳見院刊第60期“我要发言”。

與劉景芳共鳴

孫明久的一些言論頗為劉景芳賞識，從沒來往過的孫、劉，忽然促膝談心了。劉景芳聽說孫要求調動工作時說：在運動中不要作逃兵，要堅持到底，孫得到了鼓勵。

有組織，有策略

孫手下有幾個為知己者死的“士”，即基本群众。除此之外能拉的拉，拉不住的就打，積極爭取“中間勢力”。開完大會之後，又開小會，不辭勞苦到處奔走，必要時還來個臨時碰頭會，出謀劃策，佈置在會上如果提出反面意見時，立即採取一致行動——退出會場，拂袖而去。

有計劃，有目的

俄文教研組有三名黨員，他認為其中一個是“飯桶”，另一個是“小孩”，剩下的（即呂貴麟）才是斗争对象，在這次運動中非拔掉呂貴麟這個眼中釘不可。呂走後，孫就可以一揮手遮天了，其目的是要爭奪教研組領導權。

大丈夫敢作敢當

在群眾的壓力之下，孫不得不把自己的某些活動向群眾交待，孫說：“大丈夫敢作敢當”，表現自己的英雄氣概，但事實並非如此，孫在會上表現是：避重就輕，談遠不談近，只羅列一些人所共知的現象，生怕触及事實，這些並非“大丈夫敢作敢當”，而是敢作不敢當。偉大的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的“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這句話送給孫明久是恰如其分的。希孫明久能够實現他自己的諾言“敢作敢當”，真實地交待出一切言論和行動。

席，反對蘇聯。劉景芳不但教自己的孩子這樣作，同時在運動中，曾經以為可以利用青年學生缺少社會經驗的弱點而在學生中找同盟軍，但是事實證明這樣的手段必遭到大多數學生的唾棄。

我只談了這些問題，可看出劉景芳的言行與我們有着鮮明的對比。在新舊思想的問題上，我們同劉景芳沒有“和平共處”。我希望劉景芳做出徹底的檢查，交待還有時機，我們一定歡迎。

(上接第三版)